

## 标出性与标出性翻转：论中国性别文化权力转向

谭 琼

**摘 要：**中国性别文化发展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可称为男权发展的历史或者女性被标出的历史。本文将标出性理论引入性别文化研究，分析中国两性性别权力翻转的三方面动因：社会语境是性别翻转的前提；社会语境的元语言是性别翻转的内因；中项易边，中项站位变动是性别翻转的形式动因。由此得出，在中国，随着主流意识形态对性别平等的大力推动，两性互助互利互惠互乐的性别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在此背景下，男女两性性别权力的翻转不可能实现，只是出现了中国男性性别特权的正常消解，中国两性性别文化将趋向和谐发展。

**关键词：**标出性 文化标出性 标出性翻转 中项易边  
性别翻转

性别权力问题在性别研究中一直是一个热点议题，追溯性别研究的中外历史，无论是西方的女权主义的三次浪潮、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还是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或者男权主义对女权主义的集体反扑等，其实质都是性别权利之争。比如，西方女权主义的奠基之作《女权辩护》一书，涉及教育权问题，波伏娃的《第二性》反对社会对女性的建构，希望女性获得和男性同等的社会权利，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麻烦》，看似是对性别身份的颠覆，实质上是反对性别规范的暴力，涉及人的性权利问题。中国性别发展的早期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可称为中国男权发展史或者中国女性被“标出”的历史。李江峰说，从“诗三百”到“20世纪80年代”，瞻前顾后，横看竖看，竟发现每一页都端端正正写着两个大字：美女。这就是说，文学史，实际上就是“美女文学史”。<sup>①</sup>即使在今天，也还有人认为，

<sup>①</sup> 李江峰：《美女与文学史》，《文学自由谈》，2004年第5期。

“从性别文化的角度看，10%的男性控制了90%的财富和政治，这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打上了男权的标志”<sup>①</sup>。在当下中国，女性的现实境遇真的还这么悲观？

人类学家海伦·费希在新著《第一性：女性的天赋及她们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中大胆预言，女性将是21世纪的“第一性”。她认为，妇女在农业革命后成为“第二性”，但随着工业革命、市场经济的兴盛，全世界的妇女以她们的天赋才能，正逐步重新获得她们几千年前所享有过的经济影响。<sup>②</sup>这一预言能否成为中国的现实？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文化转型期，是一个多元文化共处和多元价值取向博弈的时代，也是一个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的黄金时代，中国政府积极推行性别正义，反对男性霸权主义，而中国的女性也日渐独立，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生力军。据此，笔者大胆预设，中国传统两性性别权力面临诸多被翻转的现实可能性。在本文中，笔者尝试将标出性理论引入性别文化研究，解释这一符号现象。

## 一、什么是标出性理论？

标出性理论由布拉格学派的俄国学者特鲁别茨柯伊（Nikolai Trubetzkoy）首次提出，他把“标出性”定义为“两个对立项中比较不常用的一项具有的特别品质”<sup>③</sup>，意即在二元对立中，对立的两项之间常常不对称，使用频次较少的一项，就是“标出项”，而使用较多的就是“非标出项”。

赵毅衡教授把标出性理论应用于文化符号学研究，发现了标出性理论在文化研究中的一些特殊规律。第一，提出了“中项偏边”原则。<sup>④</sup>为了解释方便，赵毅衡教授把“非标出项”称为“正项”，把“标出项”称为“异项”，他认为文化对立之间必有中项，而语言的二元对立之间不一定有中项，中项偏边是文化标出性所共有的特征。第二，界定了文化标出性与语言标出性的区别。他认为，语言的标出性首先在形态上表现出来，风格特征很明显，而文化符号的标出特征常常是一种感觉。第三，指出了标出性翻转的动因，他认为，标出项的翻转，来自中项标准的翻转，也就是社会文化元语言的变迁。第四，阐释了文化标出性的变化发展性，他认为文化标出性会随着文化的发展而变化，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标出项，有可能再度翻转，造成文化的再次

① 瘦马：《中国男性期刊的ED症》，《中国图书商报》，2003年4月25日。

② 禹建湘：《第一性：女性的追求与梦想》，《书屋》，2003年第2期，第45页。

③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80页

④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83页。

变迁。<sup>①</sup>

在文化标出性理论发展过程中，一些学者进一步扩展了文化标出性理论。比如胡易容进一步细化了文化标出性翻转的原因和机制，他指出：文化正项的“被动让位”与标出项不断自我中项化的努力共同构成了标出项翻转主体双方的关系，而标出项的历史翻转是否能最终取得成功则取决于标出项是否契合文化主导力量的趋势。<sup>②</sup>而彭佳认为，促使标出性翻转的社会文化元语言具有层次性，故中项认同并不是单层次的，各个层次的偏边情况也不一定一致。<sup>③</sup>吴未意认为，语言与文化中标出的根本原因都是社会文化元语言，中项并非完全被动，而是具有一定的主动性，一定意义上可以自我表达与界定。<sup>④</sup>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标出性翻转并非一蹴而就，它是一个变化发展的长期过程，这个过程最后聚焦为正项和异项对中项的争夺，中项的站位选择最终决定标出性翻转能否实现，而中项的站位选择取决于文化元语言对它的“诱惑”，取决于特定文化的“符码态度”<sup>⑤</sup>。在这里，笔者还考虑到一个正项和异项都可能向中项靠拢的问题，后文将要论及。

## 二、性别权力翻转的动因

厘清文化标出性理论的相关概念，对性别翻转的动因机制的界定显得非常必要。

赵毅衡教授在论证文化标出性的历史翻转这一论题时，曾以两性性别权力翻转为例。他认为：在前文明社会中，男性是标出的，女性作为正常的主项，无须标出，这种标出性的安排是自然界作的，有利于种族繁衍这个最重要的生存目的；在文明社会中，以男性活动为主的种植和畜养代替以女性活动为主的采集，提高了生产率，物质生产代替后代生产，女性开始用各种妆饰给自己身上加上风格标记，女性是标出的，而男性成为以本色示人的非标出项；在现代社会，文明把女性变成了标出符号，“加工”成具有标出性的异

①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88页。

② 胡易容：《论文化标出性翻转的成因与机制——对赵毅衡一个观点的扩展》，《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第141页。

③ 彭佳：《论文化标出性诸问题》，载曹顺庆、赵毅衡主编，《符号与传媒》（第2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8页。

④ 吴未意：《对文化标出理论的几点修正与扩展——与赵毅衡教授商榷》，《内蒙古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第184页。

⑤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25页。

项,把男人“加工”成为社会中心的正项。<sup>①</sup>为了便于借鉴他的推演方法,笔者在这里尝试用下表示例赵毅衡教授关于性别翻转的各项动因:

社会分期	标出项	非标出项	中项	标出的风格特征	非标出特征	中项翻转的动因
前文明社会	男性	女性	性别不明 性别混杂	男性生物性符号+纹身羽饰	女性本色示人	自然界的标出性安排。狩猎、采集和后代生产方面,女性具有性别优势
文明社会	女性	男性	性别不明 性别混杂	各种妆饰的风格标记	男性本色示人	物质生产代替后代生产,种植、畜养和物质生产方面,男性占有性别优势 需要女性标出的,不仅是男人,而是整个文化,也包括女性自己
现代社会	女性	男性	性别不明 性别混杂	女性自觉装扮	相对于女性,没有那么多风格标出符号	

赵先生的推演方法很值得借鉴,据此,笔者结合前论,将性别权力翻转的动因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社会语境是性别翻转的前提,具体可以表述为男女两性在社会中何者居于优势地位的问题,这取决于该社会的社会生产方式,比如,在前文明社会,社会生产方式是“后代生产”,和女性生殖率有关,故在前文明社会,女性居于正项地位;二是社会文化的语境元语言是性别翻转的内因,当然这里还涉及胡易容所说的标出项与文化主导力量契合度的问题;三是中项易边,中项站位变动,具体指在性别翻转中,女性自我中项化的不断努力和男性因为歉疚等原因主动向中项靠拢的行为,或者男性的被动让位和男女两性都向中项靠拢的情况。一般认为,最后一项是标出项翻转的决定性因素。

### 三、中国两性性别权力再翻转的诸多可能性

中国传统男性性别特权的形成是一个系统工程。杜芳琴认为,直到西周礼制建立,以华夏父系—父权—夫权为主导的社会性别制度才算正式建制<sup>②</sup>,自此以后,周代贵族及其后的统治者将这一制度模式与价值观层层推广、层层渗透,最终形成中国特殊的男性特权机制。这个特权机制是如何构成的?笔者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试图阐释这一问题:从性别分工制度而言,男主外女

<sup>①</sup>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86页。

<sup>②</sup> 杜芳琴:《如何将父权制和社会性别理论引入中国历史研究》,《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第98页。

主内，男子可以四海为家，女子只能囿于闺阁；从性别家庭制度而言，女性应“三从”，“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女性失去其独立性；从性别婚姻制度而言，男性可一夫多妻，女性则要从一而终；从性别继承制而言，子随父姓，女性无继承财产的权利；从性别教育制度层面而言，女子无才便是德，男性女性教育机会不平等；从文化规范层面来看，“男尊女卑”“男优女劣”“男主女从”是男权社会的主流文化；“贤良淑德”“笑不露齿”“缠足”“贞洁”等是男权社会中女性的行为规定；语言文化方面，存在诸多蔑视女性的表达，比如“女流之辈”“头发长见识短”“女人是扫帚星”“像个娘们”等成为骂人的日常话语；在两性审美文化层面，男性审美是“阳刚和崇高”，而女性审美强调阴柔，甚至是病态之美；最后，从性别身份认同方面而言，“重男轻女”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价值判断，性别歧视在社会上普遍存在，女性失去了基本的话语权和表达权。在中国早期性别文化史上，中国男性享有性别特权，而女性几乎处于“失语”的悲惨境地。

在这种传统男权权力观的持续影响下，当前中国部分地区重男轻女思想依然存在，女性没有宅基地和财产继承权，而在女性就业和升职方面，性别歧视仍然严重。但能不能就此判断当今中国依然是一个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笔者不以为然。笔者以为，在当下中国，男性性别特权已呈现出瓦解的趋势。当下中国的社会发展、文明演进容不得男权主义的存在，当下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为两性性别翻转的实现准备了诸多现实可能性。前文已经阐释了两性性别权力翻转的三个动因，以下分述之。

### （一）两性性别权力翻转的社会语境：社会生产方式

马克思早就指出过，人类社会的历史归根结底是生产方式依次更替的历史。<sup>①</sup>从当前的发展现状来看，中国社会进入信息时代。文森特·莫斯科柯认为，围绕信息网络建立起的信息时代，“消除了工作和家庭、劳动和休闲、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曾经清晰的界限，新的社会形态也因此诞生”<sup>②</sup>。也就是说，在信息社会中，知识劳工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以想象力、创造力、协作力、沟通力等为典型特征的知识生产取代了以“男性勇力”为特质的物质生产，这种智力生产方式打破了男权社会的勇力神话，男性的性别优势被打破。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女性大趋势》中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个说法：“女性在现代社会的体力弱势已并不重要，现代社会需要的是

<sup>①</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马恩列斯毛论历史唯物主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34页。

<sup>②</sup> 文森特·莫斯科柯：《信息社会的社会理论与知识劳工》，曹晋译，《新闻大学》，2009年第1期。

女性的智力优势。”<sup>①</sup>

当前中国社会的“妇女半边天”的说法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抛开体能的差异，男女两性谁强谁弱很难说清，不管男女两性性别竞争的最终结果如何，但这无疑给中国女性提供了一次改写性别历史的机遇。生产方式的变革必然倒逼性别制度的变迁，中国男性特权的式微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需要。当前，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对性别正义的强力推动下，中国“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被打破，女性获得和男性同等的劳动权利、教育权利、婚姻权利、财产权利、话语权利，女性已成为社会中的独立个体，男性的性别特权逐渐消解。此外，当前中国男女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衡造成多种社会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以及中国男性的“性别焦虑”<sup>②</sup>，在男多女少的情况下，女性的性别优势也可能提升。

## （二）性别翻转的内因：社会文化语境元语言

“文化无处不性别”<sup>③</sup>，这句话无疑很好地印证了社会文化元语言和性别翻转之间的紧密联系。赵毅衡教授认为，社会文化的语境元语言是元语言组成因素的最主要来源，可以称之为符用性元语言，即是文本与社会的诸种关系引出的文化对信息的处理方式。<sup>④</sup>在这里，为了表述方便，笔者引入彭佳关于社会文化元语言的分层方式，将其分为综合文化观念层面和意识形态两个部分。<sup>⑤</sup>

结合前文表格我们可以看出，性别标出的特征是“装饰”，性别非标出的特征是“本色示人”，然而在今天这个符号过度消费时代，男女都开始关注自己的外在形象，装饰不再是女性的特权，女性可以选择中性化装饰，男性亦可以选择女性化装饰，故仅靠“装饰”这一外在形式已经很难辨识男女二性何者标出。考察中国社会当下种种性别奇观，笔者发现一些有趣的文化现象：从性别的行为文化来看，男性和女性不再“看”和“被看”，而是“互看”。“贤良淑德”“笑不露齿”“缠足”“贞洁”等男权社会的女性标准或已被摒弃，或已淡化。相反，社会文化对男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传统的放浪形骸、不修边幅的“真性情”男人被扫进角落，温柔体贴、强壮有力的绅士成为女性的最爱。此外，如今的男性审美和女性审美都日趋多元化。比如在中国男

① 约翰·奈斯比特·帕特里夏·艾柏登：《女性大趋势》，陈广译，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2页。

② 彼得·杰克逊等：《追寻男性杂志的意义》，陈阳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5页。

③ 赵毅衡：《文化无处不性别》，《中国图书评论》，2014年第3期。

④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32页。

⑤ 彭佳：《论文化标出性诸问题》，见曹顺庆、赵毅衡主编，《符号与传媒》（第2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0页。

性审美的传统视域里,男性应具有阳刚之气,是强大和崇高的,男子汉形象是男性审美文化认可的主流,相反,那种阴柔的男人、娘娘腔、伪娘型男性形象是主流文化排斥的。然而反观中国现实,美男经济已成为一种现实,男女两性的多元化审美已被大多数人认同。另外,笔者考察当前社会上的一些跟性别相关的流行语,也发现一些很有“内涵”的词语。以“男闺蜜”“女汉子”为例,一般而言,“闺蜜”和女性相关,而“汉子”对应男性,这两个术语的流行大有文化深意。“男闺蜜”一词映射了中国男性“放低身段”,注重和女性的平等交流;“女汉子”一词实则是女性自我意识的强化的表现,也隐喻中国女性随着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提升而获得了话语权,不再是传统社会没有人权、毫无主见的“弱女子”。最后笔者发现性别表达也有一定的地域性,比如中国西南地区多数男性承认自己是“妻管严”,如重庆或者成都的大多数男人称自己是“耙耳朵”,还有上海男人“主内”的能力全国有名,更有一些男人视“怕老婆”为“真男人和好男人”的表征。

雷蒙德·威廉斯认为:“我们当代的共同文化,将不是往昔梦想中那种一切一致的单纯社会,而是一种非常复杂的,需要不断调整和重新规划的组织。”<sup>①</sup>中国这种相对稳定的传统男权文化观,与当前中国性别文化的现实语境以及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已经到了非调整不可的关口。中国政府的相关执政者和一些有识之士也深刻意识到这一点,在政府部门和相关性别组织的推动下,中国性别制度和性别文化趋向良性发展。比如,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1953年的《选举法》规定了妇女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54年颁布的《宪法》再次重申妇女和男子的平等权利;1992年,《妇女权益保障法》出台,对妇女的各项权益作了具体规定;1995年,在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之后,男女平等思想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思想,此后,中国政府进一步强化这一主流文化思想,提出两性和谐发展,构建先进性别文化的理念,“男尊女卑”“男优女劣”“男主女从”的男权文化被推翻。笔者考察近五年的国家社科基金申报指南,发现涉及性别研究的选题逐年呈上升趋势,中国女性开始重构自己的知识谱系,这些举措为中国女性的性别权益提供了保障,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男性的性别特权。两性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逐渐在中国形成一种普适的性别平等价值观。

<sup>①</sup> 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11页。

### （三）性别翻转的形式动因：中项站位问题

在二元对立的动力系统中，中项是个颇具话题性和争议性且又十分迷人的命题。性别翻转的过程由于涉及多个意义元，更让笔者觉得扑朔迷离。性别翻转中的中项具体指什么，依然是“非男非女、亦男亦女”时的性别裹挟吗？笔者对此持怀疑态度。在中国汉字文化史中，五四以前，男女统称“他”，直到1917年，诗人刘半农第一次在其诗《叫我如何不想她》中用到“她”字。故在前文明社会和文明社会的第一次性别翻转过程中，不存在性别裹挟时用“他们”这一文化现象，该现象只有1917年后才可能出现。更何况，文字一经产生，便具有极强的生命力，文字“取名”一旦形成，获得社会文化的集体认同，进而成为一种习惯后，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几近为零。如果仅以性别裹挟的形式为标准，笔者以为，中国永远不会有性别翻转的可能。故在这里，笔者认同陆正兰教授的观点，这里的中项站位原则应该是“文化重要性偏边”或者“意义偏边”<sup>①</sup>或者其他，可能还涉及特定文化的“符码态度”问题，具体而言指易边时中项的站位态度，当然这也是以吴未意的观点——“中项也具有的一定的主动性”<sup>②</sup>为前提的。

解决了这个疑问，我们再来探讨性别翻转中正项—中项—异项三者之间的动力关系。笔者在前论中提到了中项站位的两种可能：女性自我中项化的不断努力和男性因为歉疚等原因主动向中项靠拢的行动，或者男性的被动让位和男女两性都主动向中项靠拢的情况。要解释这两种可能性，就要引入性别意识这一概念。方刚认为，“性别意识是在性别基础上的对于自己和世界关系的认识，性别作为一种生理属性和社会属性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并在此基础上构成了我们对社会、他人、自身等的认识”<sup>③</sup>。性别意识可分为男性性别意识和女性性别意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女性主义研究者的一个常提常新的话题，有“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必然也有“男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一可能。著名心理学家哈伯·哥登伯格在他所著的《新男性：从自我毁灭走向自我保护》中有这样的描述：“男性是在我们社会中最后一个被明显地否定和歪曲而没有任何反抗的亚社会团体。”他指出如果女性被社会文化加工成“性工具”，男性则被社会文化加工成“劳动工具”，本质上说，男女两

① 陆正兰：《“概念对喻”与歌词中的性别符号标出性》，《南开学报》，2014年第6期，第41页。

② 吴未意：《对文化标出理论的几点修正与扩展——与赵毅衡教授商榷》，《内蒙古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第184页。

③ 周洪超、方刚：《具有性别意识男性的男性气质研究》，《中国性科学》，2015年第11期，第111页。



性都是“男权宰制”的牺牲品，都是社会异化的产物。<sup>①</sup> 意识到这一点，男性和女性都有可能主动或者被动向中项靠拢，逃离男权主义建构的樊篱。

至于中项的站位态度问题，就必须具体谈到“符码态度”。在符号表意中，“符码”指符号编码和解码的规则。赵毅衡教授认为哪怕符码是现成的，如何使用它依然涉及文化问题：在纪律严明的文化中，符号的编码和解码都不允许过分自由；在某些文化中，严肃的秩序指示，被看成是似有若无的符号。<sup>②</sup> 当今中国的性别文化语境是纪律严明的文化语境，强迫中项在男女两性的二元对立中作出对的选择，中项迫于正项和异项的压力，可能会保持观望。但随着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大力推动，比如当中国政府提出建设“和谐两性关系”的愿景，既反对男权主义也反对女权主义时，中项会据此明确自己的符码态度，作出“理智”的站位选择，与主流文化保持一致。具体表现为，中项既不做“男权主义”的“类别符号”，也不做“女权主义”的“个别符号”，它保持中立，使自己的站位不偏不倚。在这种情境下，两性性别权力的再翻转不可能实现。

#### 四、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当下中国只是出现了中国男性性别特权的瓦解，“两性性别权力的再翻转”已然不可能实现，人类学家海伦·费希的“女性成为21世纪的第一性”的预言，亦不可能在中国成为现实。该结论对于中国女性而言或许有些令人失望，但其实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假若把一个硬币比作人类的话，男人和女人就是这个硬币的两面，失去了两面中的任何一面，硬币也就失去了其作为硬币的价值。对于人类而言，男人和女人都不可或缺，失去其中的任何一类，人类都必将走向灭亡。作为一个性别理想主义者，笔者以为，男女两性在当今中国良好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应抛开历史的“爱恨情仇”和对性别问题的成见，在承认两性差异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发展，共创人类美好未来。

作者简介：

谭琼，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15级符号学博士生，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sup>①</sup> 方成：《男性的觉醒》，《读书》，1997年第4期，第28页。

<sup>②</sup>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